

再论邓小平的效率和公平观

唐 蹕^{1,2}

(1. 同济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上海 200092; 2. 贺州学院 人文管理系, 广西 贺州 542800)

[摘要]为激发和调动“经济人”趋利求富的欲望和动机,使国家和人民尽快脱贫致富,邓小平提出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大政策”,其思想的着眼点在于效率;邓小平将“共同富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并作为最终的价值旨归,其思想的重心无疑是公平。“先富”和效率只是手段和策略;“共富”和公平才是目的和归宿。在中国目前“先富”与“共富”远非完全和谐、甚至出现严重的贫富差距的背景下,党的十七大正式提出深化分配制度的改革,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十七大的这些提法是对邓小平“先富”与“后富”思想的继承和发展,也体现了在新时期实现“效率和公平”和谐统一的必然逻辑。

[关键词]邓小平;效率与公平;策略与归宿;贫富差距;继承和发展

[中图分类号] D6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9477(2010)02-0044-04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重新解读邓小平“先富”与“后富”经济思想中蕴涵的丰富的效率和公平的逻辑关系,对于我们全面领会和准确把握十七大精神,对于明确进一步深化分配制度改革的方向和任务,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和直接的现实意义。

一、话题:从“经济人”逐利求富本性谈起

“经济人”称谓的原创人应该归功于西方古典经济学的奠基人之一的亚当·斯密。他的“经济人”的假设是:“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人做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以获得你所要的东西。这句话是交易的通义……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出于他们自利的打算。”^[1](P13-14)]很明显,“经济人”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等价交易”和“自私自利”。当然,亚当·斯密在强调“经济人”本质特性的时候同时也指出了,“经济人”的自私自利的行为会受到内外两个方面的约束:即内在的理智、道德的约束和外部的法律的约束。这两个方面的约束制约着“经济人”,使他们的自私自利是有条件的,并非可以随心所欲不择手段地为自己谋取利益。

“经济人”的存在,根源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生产力的不发达导致的社会财富的稀缺,劳动还只是人们获取生活必需品的的手段;其二是在物质财富不足的情况下,为了生存而未曾改变的人的本性——趋利。因此,只要不违反法律,只要他(她)自己心安理得,“经济人”的逐利行为就会被社会和主流意识形态所认可。从中国漫长曲折的历史来看,中国古代和近代的统治阶级和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在法律和事实上都认可甚至鼓励“经济人”的追逐私利行为的,所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即是最好的诠释。当然,我们并不否认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蕴涵着丰富的甚至是天然的“大同”和“均贫富”思想,可以看作是对主流思想的“反动”,比方说康有为在《大同书》中表述的“公农、公工和公商”的“三公”思想、章太炎称“均田一事,合于社会主义”的思想为其先;“孙中山提出国民党的民生主义,目的就是要把社会上的财源弄到平均,所以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2](P209)]的思想,毛泽东发动人民公社运动、搞公共食堂,对供给制的偏爱和对商品经济和工资制的偏见为其后,无不表明中国平均思想的不绝如缕。先哲的“大同”理想从来就是无法实现的乌托邦,而时常在朝代末世农民起义中实行过的短暂的“等贵贱,均贫富”最多可以算是前苏俄历史上的

曾经有过的“战时共产主义政策”,仅仅是权宜之计而已。倡导“均平”思想的起义领袖们,不管他是农民出身还是血液里流淌着贵族的基因,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在大局鼎定以后立马恢复旧的秩序,“经济人”的逐利求富的行为和思想又一次得到认可。综观历史,真正从根本上拒斥“经济人”的时代恐怕最有代表性的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1957—1977年这一段时期。共和国在这段长达20年的时间里,由于受到全局性的极“左”思想的控制,片面、机械地理解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关于未来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原则条文,在理论上和实践上两个方面形成了一系列约束“经济人”出现和存在的制度和观念。由来已久的“经济人”终于在20世纪的50年代末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从“经济人”变成了“计划人”。

从制度层面看,我国实行单一的公有制基础之上的计划经济体制。在这样的体制之下,全部的资源是由中央计划部门统一配置,经济决策是由代表社会全体利益的计划机关集中做出,然后通过自上而下层级制原则组织起来的“整个社会”去执行。非常明显,这种体制是以“单一利益主体假定”为前提的。^[3](P164)]这种假定想当然的认为,国家代表全体人民的利益,共和国的整体利益即是全体人民的利益,除了国家的整体利益,实际上或理论上不承认或实质上也没有承认企业的局部利益和劳动者的个人利益。企业和劳动者只是计划经济的工具,没有任何自身利益可言。成本、利润和价格等经济范畴的核心概念此刻已经变成了单纯的核算符号,里面不包含任何利益的成分。在这种体制下,企业和个人的逐利欲望日趋淡薄,逐利能力日趋衰退,它(他)们只会奉命行使,完成上级交付的使用价值的生产任务,而将自身物质利益的提高和生活质量的改善完全寄托在国家计划的安排上。因为,在此体制下,人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在某种意义上完全被扼杀了或至少处于高度休眠状态。久而久之,“经济人”就变成了十足的“计划人”。^[4](P142-149)]从观念层面来看,从国家的意识形态到一般民众的思想观念都打上了计划经济时代的深深的烙印。“左”的路线认为,社会主义应该是计划经济,应该是公有制的一统天下——“一大二公”是其典型;人民的收入分配应该是平均主义,财富共赏——公共食堂是其典型。国家和政府将个人追求正当物质利益的行为如农民搞家庭副业、自留地、商品流通等等一概视为“非法”和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东西加以禁止和除掉——“割资本主义尾巴”是其典型。整个社会弥漫的不是逐利求富的思想而是“怕富”、“仇富”的狂热和患上了严重的“言利”失语症。这种现象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甚至更晚一些时候在中国普遍存在的。

在那样的日子里,倘若有人偶尔有逐利求富念头的闪现,在

那个“政治挂帅”和“斗私批修”的年代,也会在自我谴责和“众怒难犯”的畏惧中将那罪恶的念头抛弃。“言利”、“言富”成为人们惟恐避之不及的瘟疫和“扫把星”被人们疏远,“它们”只能作为人的一种自然本性深深地隐藏在心底。在这种制度和文化环境下,人的逐利本能退化到了消失的边缘,“经济人”的完整性遭到了严重的扭曲,直接的后果是人的积极性、创造性和聪明才智受到压抑,经济运作的效率低下。平均主义和计划经济带来的不是共产主义的烂漫春天而是普遍的贫穷的寒冬腊月。中国与西方发达国家的差距愈来愈大,“贫穷”成了社会主义的代名词。邓小平对此是不满意的,他决心要改变这一状况。

二、“大政策”：“一部分人先富”着眼于解决效率问题

邓小平早就对“四人帮”鼓吹的所谓“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论调深恶痛绝。第二次复出后,他一方面从改变制度着手,另一方面从改变“计划人”的意识着手,启发人们本性中的正当的、在现有生产力水平下既自然又有益的自利欲望,将严重压制着的“经济人”本性加以复归。邓小平经济体制的改革正是从这里起步,他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逻辑起点也在此。1975年,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就在思考经济活动中的利益驱动问题。当年6月在上海的一次谈话中他指出:“中国这么多人,国民经济搞不上去怎么办?……批‘唯生产力论’,谁还敢抓生产?现在把什么都说是资产阶级法权,多劳多得是应该的嘛,也叫资产阶级法权吗?搞生产究竟应当用什么东西作为动力?”^[5]邓小平在这里提出了“多劳多得”是人们从事生产的直接动力的思想。1978年12月在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邓小平进一步将“多劳多得”观发展为“多劳多得,重视物质利益的”观念。他说:“不讲多劳多得,不重视物质利益,对少数先进分子可以,对广大群众不行,一段时间可以,长期不行。”^[6]很明显,邓小平认为,除了少数先进分子外,绝大多数人从事生产劳动,其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追求物质利益是一种维持生存的起码需要,是一种最基本的人权。既然劳动者参加劳动是为了自身的利益,自然“多劳”就想“多得”。这样的话,工资分配上的平均主义就成了问题,平均主义的出发点是基于传统社会主义观把“计划人”的劳动目的看得十分的高尚和纯粹且已无任何私利和私心的假设;而事实上这种假设是一种虚构的“乌托邦”。因此,打破平均思想,承认“多劳多得”,认可物质利益原则作为一种动力激励机制便成为很自然的事情了。正如邓小平指出的:“如果不管贡献大小、技术高低、能力强弱、劳动轻重,工资都是四五十块钱,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但实际上是不符合按劳动原则的,这怎么能调动人们的积极性?”^[7]邓小平还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他在这里指出了大锅饭式的平均主义的工资分配制度是不公平的,并且阻碍劳动者的积极性的发挥。1978年3月,邓小平在同国务院政研室的负责人谈话时进一步指出:“评定职工工资级别时,主要是看他的劳动好坏,技术高低,贡献大小。”“颁发奖牌、奖状是精神鼓励也不能缺少。在这方面,我们过去行之有效的各种措施都要恢复。奖金制度也要恢复。”^[8]

在1978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的闭幕会上,邓小平更深入具体地提出了物质鼓励的原则,激发人们的求利动机,调动大家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把生产力和经济发展的原初动力发动起来。他说,企、事单位“要严格考核,赏罚分明……要有学术职称、技术职称和荣誉称号。要根据工作成绩的大小,好坏,有奖有罚,有升有降。而且,这种赏罚、升降必须同时同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这样做的目的是:“通过赏罚分明,在这些战线上形成你追我赶,争当先进,奋发向上的风气。”他的这些大张旗鼓地倡导“物质利益”来进行赏罚和争当先进与物质利益挂钩的言论宛如春天的惊雷,唤起了劳动者久已湮没的利益动机,人们的逐利的欲望由此萌生,趋利行为和动机变得合理和合法,中国劳动者从“计划人”向“经济人”的复归进程从此开始。

邓小平提出恢复“按劳分配,多劳多得”原则和倡导“物质利益原则”的思想对于激发人们的正当的逐利欲望,刺激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和创造性,促进“计划人”向“经济人”的回归,无

疑起到了明显的启动作用。但是,如何把这些原则变成看得见、摸得着的巨大的生产力和丰富的物质财富,这是邓小平下一步要思考的和解决的问题。就当时来看,至少有两个方面还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了“计划人”的求利动机和本能。一是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一是传统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束缚。这两个方面在前面都已论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指出的是,计划经济体制从制度层面、传统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从思想层面强化了平均主义的理念,排斥逐利的欲念;计划经济体制的非营利操作契合了传统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态对追求私利动机的否定,而这种整个主流社会对追求私利的非议反过来强化了计划体制下的非营利操作;两者相辅相成,构成了一个被有些学者称作的“超稳定结构”,它严重地阻碍着人们利益欲望的启动。

在思考如何打破这一超稳定的结构,快速、有效地激发人们的求利动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改变中国的贫穷状况时,邓小平想到了曾经在太行山区实行过的“富民”政策。在太行根据地,为克服战争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物资的极度匮乏,邓小平采用了“富民”政策,从内心深处调动了老百姓和革命军人的致富欲望,使根据地度过了一个又一个困难,让太行区的人民和军队过上了在当时条件下相对富裕的生活。现在面临的情况与以前虽然有很大的不同,但人民的求富欲望,人民希望改变贫穷的状况让日子过得好一些是一样的。

终于,一个被邓小平称之为“大政策”的决策出台了。1978年9月20日是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邓小平在听取天津市委工作汇报时,首次提出:“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9]的思想。接着他又在同年12月13日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从“这是一个大政策,一个能够影响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的政策”全局的高度,再次重申了这一思想。邓小平提出的这个“大政策”无疑使相对僵硬的原则不但变得通俗易懂而且变得具体而易于操作了,它将亿万人民被压抑但从来没有泯灭的“经济人”本能调动起来了。因为,求富的渴望符合人的本性,人皆有之。这一本性在生产力没有达到相当发达的程度以前,是不会自动消失的。如果人为的压抑,扼苗助长式的否定,则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结果与人的善良的愿望相悖,会导致灾难性的后果。在生产力水平还不高的情况下,在社会财富还很丰富的情况下,在劳动还仅仅是人们谋生的手段而并没有“成为第一需要”的情况下^[10],“求富”往往与解决人的基本生存问题相联系。这就使得饱受贫穷之苦的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人的求富心情更加迫切,欲望更加强烈。因此,一旦提出“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和政策,必将将人民心中多年被压抑的逐利欲望激发出来——“一石激起千重浪”,并迅速地转化为趋利求富的行为,发展生产力就有了提供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动力。

“大政策”具有的新意和震撼力是难以估量的。中国历史上似乎还没有哪位先哲这样直白地提出这样的口号,它是一种新理念、新思路、一个新政策和一项新政策。新中国成立后,由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种制度意识形态的严重对立,我们对“利”、“对”“富”一直抱有忌讳、戒备、鄙视的心理:总以为,“求富”“求利”是资本主义的专利,是庸俗的东西;“富”了会导致滑上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的邪路;“富了”反而不好,穷才有骨气,“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社会主义的苗”。邓小平则一反这种不正确的传统思维定势,从平均主义严重束缚生产力发展这一中国的实际出发,提出了振聋发聩的口号,从而把埋藏在人们心中多年的正当的致富欲望激发出来了。邓小平的“先富”政策极大地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效率的提高。

三、共同富裕:终极价值所关注的重心是社会公平

邓小平在1978年提出“先让一部分人富裕起来”的思想时,是把它作为实现共同富裕的一种方法或策略来使用的,首先着眼于效率的提高(当然也关注公平,比方他说平均主义“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大家是平等的”其实不公平)。因为他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所以必然要消灭贫穷,要走向富裕。但是,在中国当时的情况下,要让全国人民同步同时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显然是不可能的,因此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人通过合法经营和辛勤劳动先富起来。这一思想没有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原则,恰恰相反是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的生动体现。他的“大政策”的直接目的是要把“经济人”心中压抑着的正当的逐利、求富欲望彻

底唤醒并见之于求富的行动之中去。但是,“先富”不是终极目标,“共同富裕”才是邓小平的终极价值关怀。邓小平在1978年12月的一次讲话中明确地表达了这一终极关怀,他说:“在经济政策上,我认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入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11]他又说:“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快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12]可见,邓小平认为“先富”是“共富”的“捷径”,是通过示范、帮助和带动更多的人致富这种波浪式的推进方式达到“共富”。“先富”是以“共富”为旨归的,是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原则框架内,用颇具新意的方法有效地解决社会主义各国普遍存在的劳动者缺乏积极性创造性问题的典范,体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这无疑是邓小平的高明之处。借着“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大政策”的强劲东风,一部分人通过自己的努力率先富裕起来了。改革的前路先锋们的实践和创新形成了对旧的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经济体制和陈腐的观念的冲击的第一波,迫使旧的体制按其规章制度被迫做出调整,陈腐的观念遭到摒弃,推动了改革的发展和社会的巨大进步。随着市场取向成为中国改革的风向标,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中国公民分层地、前后相继地、渐进式地完成了从“计划人”向“市场人”角色的转换,为市场经济取代计划经济打下了最重要的人的基础。

难能可贵的是,邓小平既充分认识到全国一下子富裕起来是不可能的,又清醒地估计到随着经济的发展将会产生贫富差距扩大的问题。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是刚刚从旧社会脱胎出来的社会,带着其脱胎出来的那个社会的痕迹,包括生产力水平低,社会财富不丰富,剥削阶级的意识形态和落后习惯势力大量存在,群众的觉悟和精神文明水平也较低,不可能在短期内创造出“共富”所需的全部条件。特别是发展生产力更是一项长期艰巨任务,中国要初步实现现代化至少需要半个多世纪,所以共同富裕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只能逐步达到。如果急于求成,必将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诚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13]

邓小平当然也清楚,“经济人”个人的、出于本能的趋利动机和求富欲望,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一种手段;当人们的趋利、求富动机和欲望通过观念和制度变更产生后,在生产力获得巨大发展,效率上去了,人们比较富裕的时候,党和政府的工作重心就应该适时地调整到更多至少是同等程度地关注“共富”即终极目标和价值上来了。邓小平认为,先富帮助后富是一个义务。他说:“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14]既然是义务,就可以采取多种办法来完成,除了进行宣传、鼓励和劝说外,国家应该充分发挥行政权力的强制作用,可以由中央做出规划,做出规定,带强制的性质。比如,“拿西藏来说,中央决定,其他省市要分工负责帮助西藏搞一些项目。而且要作为一个长期的任务。”^[15]沿海地区发展到一定的时候,中央“可以要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16]邓小平认为不仅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义务,可以带有强制性,而且先富的集体和个人帮助后富的集体和个人也是义务,也可以带一些强制的性质,不过这种强制,必须符合市场经济的要求,不能破坏他们作为市场主体的权利,具体的形式主要是上交利润、国家税收等。他指出:“对一部分先富裕起来的个人,也要有一些限制,例如,征收所得税。”^[17]他还说,为了避免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解决的办法之一,就是先富起来的地区多交点税,支持贫困地区的发展。”^[18]这里所说的多交点税当然包括这些地区的集体和个人了。1990年7月3日,在视察北京亚运会场馆等市政建设工程时他指出:“现在有些地方,允许早一点,快一点发展起来,但是到一定程度,国内也好,地区也好,集体也好,就要调节分配,调

节税要管这个。”^[19]除了强制的办法,他还提倡自愿,有些属于市场交易行为,如向贫困地区、单位投资、“技术转让等方式”,有的则是个人公益行为,如“有的人富裕起来以后,自愿拿出钱来办教育、修路。”^[20]

至于先富帮后富的时机选择,邓小平一方面将先富帮后富、帮后富提到社会主义的本质的认识来认识,要求党和政府作为重要的工作来抓;另一方面又非常谨慎地告诫大家选择帮助的正确时机。如果时机把握不好,操之过急就会削弱先富地区、先富集体和先富个人的活力和动力,影响他们的发展后劲,起很坏的作用。因此,邓小平认为,至少在20世纪末以前不宜作为中心课题,不宜全面开展这项工作。这一时期应该为先富者创造更好的发展环境和发展的条件,保护好他们的积极性和合法权利,使先富者的经济迅速地发展壮大,等他们的经济承受力和心理承受力足够强大的时候再说。所以,直到1992年著名的“南巡谈话”为止,他在谈到先富帮后富的时候,都没有忘记提醒大家,这是“将来”的事情,“太早这样办不行,现在不能削弱发达地区的活力,也不能鼓励吃‘大锅饭’。”^[21]要先让富裕者发展到“一定程度”,“一定时候”,待条件具备了才能“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2]他预计“到本世纪末达到小康水平的时候,就要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23]他做出这个估计是在1992年春,距20世纪末还有近十年的时间。当时中国的贫富差距问题并不是很突出,社会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平均主义的“大锅饭”与经济发展的矛盾,所以邓小平基本上没有制定和实行过解决贫富差距的具体的政策和措施。具体应该在什么基础上、在什么时候突出地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比较合适,他认为这是一个需要“研究”的问题。

虽然,邓小平的有生之年主要关注的是“经济人”——劳动者的积极性即效率问题,但是他并没有忽视贫富分化和收入差距的问题,邓小平逝世前的最后几年就非常关注这个问题,并且已经提出了一些思路和办法。虽然邓小平没有直接说明“共同富裕”就是公平,但是凭着他的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和对人类社会未来发展前景的深切理解,他提出了“共富”的价值目标,作为市场取向改革的价值承诺,他实际上是提出了一个极其深刻、持续时间极其长久的,在不同发展阶段会有不同要求的崭新的课题。我们不能苛求他。如何交出一份漂亮的答卷,不但是本届政府而且是将来历届政府面临的难题和考验。

四、更加注重公平:效率与公平逐步实现和谐和统一

邓小平后来将“共同富裕”概括为社会主义的本质之一并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终极价值目标和旨归。他关于“共富”的价值承诺给我们提出了一个充满未知因素的、因而更具挑战性的难题。市场经济取向决定了一个“经济人”的个人欲望和能力得以张扬。市场经济的自发运作,即使完全遵守“经济人”的理性也必然导致具有不同人力资本的劳动者、经营者个体之间的收入差距扩大。众所周知,市场经济是遵循价值规律配置资源的经济,中国丰富的劳动力资源必然使其价格(工资)处于低价值的低端,而其他生产要素如资本、技术知识、管理经验和能力等因其稀缺而身价倍增、雄居高端。这必然会使拥有不同生产要素的个人之间的收入差距迅速拉大。市场经济还具有“马太效应”,即可能出现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基尼系数是国际上通用的反映贫富差距的指标。在“经济人”逐步取代“计划人”的过程中,伴随着生产力和效率的不断进步和提高的是城乡之间、工农之间、头脑之间和行业之间基尼系数不断扩大。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中的一个必然现象,在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穷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达到10倍。但是中国的贫富分化已经远远超过了发达国家的水平。改革30年来,我国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人均收入普遍增加,居民生活普遍好转。同时,基尼系数也留下了一条明显升高的轨迹,从收入差距最小变为最大的国家之一。1994-1997年我国的20%最富的家庭收入与最低20%家庭收入的差距从10.34倍扩大到12.4倍。^[24]国家统计局在1999年的抽样调查显示,中国城镇居民收入最高的20%与最低的20%人均收入8:1,北京的数字是11:1。^[25]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等内容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虽

然各方专家测算的数据有差异,但中国的基尼系数(衡量收入差距的指标)已在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之上并无争议。2006年,“中国社会形势分析与预测”课题组对在中央党校学习的百余地厅级官员进行问卷调查的结果显示,在回答“当前我国要特别注意解决好哪些问题”时,“居民收入差距”成首选;在回答“我国当前必须注意的主要风险”时,“贫富悬殊”居榜首。中国收入差距扩大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不重视初次分配的公正问题就是其中的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为打破计划经济下的平均主义“大锅饭”,鼓励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强调“效率优先、兼顾公平”是必要的。但在发展市场经济过程中过分追求效率忽视公平的结果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更有甚者,我国出现的贫富差距现象很多不是源于自然“经济人”的自然分化而是非正当的甚至违法所造成的。前述已经指出,“经济人”的逐利欲望必须在内外两个条件下才是正常的,如果“经济人”为追逐私利突破良心和道德的堤坝从而非法经营或获利,这便突破了邓小平“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的前提条件:既通过自己的合法经营和辛勤劳动,而不是损人利己和违法犯罪。而问题的严重性在于,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当中确实存在在发家致富的过程中逾越了“经济人”的理性,即是说这部分理性缺失的富人不是基于自己的辛勤劳动的“多劳多得”,亦非依靠个人的技能特长或聪明才智合法经营致富,而是通过以权谋私、贿赂垄断、走私做假等非法手段取得“黑色”“灰色”的收入而暴富。这些非正当的不“公平”的做法引起了人民的极大的不满,严重挫伤了人民的求富的积极性和阻碍了生产“效率”的提高,成为影响社会和谐构建和孳生不稳定因素的根源之一。因此,采取各种行之有效的政策和措施,抑制“经济人”的理性缺失和变质,提高他们的市场道德素质和法纪意识是当务之急。

2003年,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经突破1000美元,正向3000美元新目标迈进。我国政府已经宣布我国进入小康社会,并在同心同德进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历史时期,改革开放步入国际社会通称的由小康社会向发达社会转型时期。国际经验表明,这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是社会问题频发的不稳定时期。这一时期作为社会调控器的社会政策的作用特别明显也尤为重要。如果政府政策得当,则能推动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即“拉美陷阱”:经济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拉大,社会矛盾加剧,出现有增长而无发展的怪事,甚至导致社会动荡和倒退。^[26]在这样一个时期,妥善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保持和实现“先富”与“共富”即效率与公平的协调和统一,对于

建设“和谐社会”和实现经济社会的持续健康发展意义十分重大和深远!

总之,贫富差距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和谐社会的重要因素之一。如何看待和应对邓小平在上个世纪末提出的尚没来得及解决的“政治遗嘱”自然成为党和政府的亟务。值得欣慰的是,我们党和政府都已经清醒地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并在着力解决这一问题。中共十七大首次提出,在初次收入分配中要实现公平与效率的统一,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中共这一理念变革,意在遏制近年收入分配状况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只有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促进效率和公平的有机结合,才能促进国民收入合理分配,最终既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参考文献]

- [1] 亚当·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M]. 北京:商务印书馆,1997.
- [2] 薄一波. 若干重大决策与时间的回顾(上)[M]. 北京:中共中央出版社,1991.
- [3] 吴敬琏. 计划经济还是市场经济[M]. 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1993.
- [4] 许新三. 邓小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再解读[M].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04.
- [5] [9][22][23] 邓小平思想年谱[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 [6] [7][8][11][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M]. 146,30-31,101-102,152,155,346,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 [10]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M].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 [14][15][16][17][18][19][20][21] 邓小平.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M]. 155,246,278,111,374,374,111,374,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 [24] 李强. 中国居民收入差距与展望[J]. 新视野,1999,(4):37.
- [25] 唐埭. 重视城市的贫富分化显现[EB/OL]. www.cass.net.com,2004-08-04.
- [26] 中共首次强调在初次分配中体现公平以遏制贫富差距[EB/OL]. 新华网,2007-10-17.
- [27] 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EB/OL]. 新华网,2008-01-09.

[责任编辑:王云江]

New explanation on Deng Xiaoping's thought of efficiency or fairness

TANG Chuo

(1. School of Marxism Studies, Tongj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92, China;
2. College of Humanity and management, Hezhou College 542800, China)

Abstract: To inspire and mobilize the economic man's desire and motivation to make rich and to make the country prosperous and the people rich as soon as possible, Deng Xiaoping put forward "the great policy" of Let some people "rich at first", which is focused on the logic of efficiency; Deng Xiaoping looks "common prosperity" as the essence of socialism, and as the ultimate value goal, his thought is fair. First and efficiency are only a means and strategy; common rich and fair is the purpose and destination. In China, the relationship of "rich first" and "common rich" is far from complete harmony, there is even a serious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now, the CPC brings forth the reform of distribution system, the relation of efficiency and fair should be emphasized in the course of the primary distribution and redistribution and more equitable be emphasized in redistribution. These thought in the 17th NC of the CPC is not onl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Deng Xiaoping's "rich first" and "common rich" thought but also it is the inevitable logic to the harmony of efficiency and equity in the new era.

Key words: Deng Xiaoping; strategy and destination; efficiency and fair; the gap of the rich and the poor;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